

MOZI YIZHENG
GUANLI SIXIANG YANJIU

墨子义政管理思想研究

刘晓庆◎著



MOZI YIZHENG GUANLI SIXIANG YANJIU

墨子义政管理思想研究

刘晓庆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义政管理思想研究 / 刘晓庆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308-14754-5

I. ①墨… II. ①刘… III. ①墨翟(前 480~前 420)
—管理学—思想评论 IV. ①B224.5 ②C9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5985 号

墨子义政管理思想研究

刘晓庆 著

责任编辑 田 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7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54-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2013N123）

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资助出版

宁波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创新实践基地阶段性成果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墨子管理思想研究综述	(2)
第二节 选题立意	(8)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0)
第一章 “贵义”作为管理目标	(12)
第一节 义政的含义	(13)
第二节 义政的原因及必要性	(18)
第三节 义政的方法	(22)
第二章 “兼爱”作为管理的价值原则	(29)
第一节 兼爱的含义及与儒家仁爱的区别	(29)
第二节 兼爱的特点	(37)
第三节 兼爱的可行性	(41)
第三章 “天志”作为管理的形上学根据	(47)
第一节 天的特性	(50)
第二节 尊天事鬼的必要性	(57)
第三节 天志对人的要求	(63)
第四节 天志与墨子其他学说的关系	(67)

第四章 “非攻”之竞争战略	(72)
第一节 攻伐的原因	(73)
第二节 攻伐的危害	(77)
第三节 非攻之战略	(80)
第五章 “尚同”之组织管理	(88)
第一节 尚同的原因	(89)
第二节 尚同的方法	(94)
第三节 尚同的意义	(104)
第六章 “尚贤”之人员管理	(108)
第一节 尚贤的内涵	(109)
第二节 贤士的特性	(115)
第三节 尚贤的方法	(121)
第七章 “节用”之财政管理	(129)
第一节 节用的必要性	(130)
第二节 节用的原则	(137)
第三节 节用的内容	(142)
结 语	(147)
参考文献	(153)
后 记	(158)

导 言

墨学形成于战国时期,显赫一时,与儒家并列为显学,之后到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逐渐陷入沉寂,一度成为绝学,直到清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传人才重新复苏。进入 20 世纪墨学研究又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兴衰起伏。20 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呈现出繁荣局面,由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博爱等精神都能在墨学中找到相类似的学说,因此随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掀起了墨学研究的热潮,像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一流学者都投入了对墨学的研究。^①之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由于政治的过度干涉和影响,墨学研究陷入低谷。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步入 21 世纪,墨学研究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一般认为,墨子是战国时期鲁国人,工匠出身,被誉为“平民思想家”,与其弟子一起创立了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学派,之后墨分为三,分别为西秦之墨、东方之墨和南方之墨。《墨子》一书是墨家的一部著作总集,大部分都是墨子后学记录整理的,是墨子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和第一手资料。《墨子》今存 53 篇,胡适将其分为五组,得到了学界的公认。^②第一组从《亲士》到《三辩》共 7 篇,一般被称为“杂篇”,邢兆良将其称为“通论”^③,内容大都是对墨子基本思想的发挥。第二组从《尚贤上》到《非

① 参见郑杰文:《20 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5 页。

② 参见郑杰文、张倩:《墨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 页。

③ 参见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7 页。

儒下》共 24 篇,是著名的墨子“十论”,邢兆良称其为“专论”,是墨子思想的主体,一般认为这是前期墨家的作品。将墨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始于胡适,后冯友兰继之。^① 第三组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共 6 篇,被称为“墨经”或“墨辩”,是墨子逻辑思想和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属于后期墨家作品。有些学者尤其是反对前后期之分的那些学者,例如陈柱、栾调甫、伍非百、詹剑峰、邢兆良、杨俊光等,认为这一组或其中一部分是墨子自著,但都无确据。^② 第四组从《耕柱》到《公输》共 5 篇,被称为“墨语”,邢兆良称其为“墨述”,是弟子对其言行的记录,形式上类似《论语》。第五组从《备城门》到《杂守》共 11 篇,被称为“墨技”,记述了墨家守城之法。历史学家蒙文通考证说,这一组应为西秦之墨所著,因为多出现秦国所独有的刑制,为其他六国所无。^③ 其中墨子的社会学说和思想主要体现在杂篇、十论和墨语这三部分当中,也有学者认为墨辩的相关论述是墨子社会学说的根基。

第一节 墨子管理思想研究综述

一、主要研究成果

关于墨学的研究,郑杰文先生在《20 世纪墨学研究史》和《中国墨学通史》中,将其分为如下领域:《墨子》整理、墨家社会学说研究与评价、墨学史研究与考证、墨辩逻辑与墨家科技研究、墨家军事学说研究等。郑杰文指出,清代中后期之前的墨学研究主要围绕义理阐发和文献考证两大方面,清代中后期之后在此之外又兴起了墨辩研究。^④ 鉴于本文主要论述墨子的管理思想,在方法上属于义理阐发,在内容上属于墨家社会学说的研究与评价,因此只就这一部分的研究文献作一番综述和概括。关于 20 世纪及其之前的研究情况,郑杰文等相关墨学史研究专家已经作

① 参见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3 页。

② 参见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4 页。

③ 参见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37 页。

④ 参见郑杰文:《20 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对于这一部分的综述,主要概括和征引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2000—2010年期间的墨学义理研究情况,笔者略作概述,尤其突出管理学的角度。

对墨家思想的研究与评价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当时正处于百家论争之时,诸子例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大都从自身的主张出发,非议墨家思想。他们对墨家的指责主要体现在批评墨家“无父”(《孟子·滕文公下》)、“慢等差”(《荀子·非十二子》),以及“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然而这种以己非人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秦汉之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几乎成为绝学。间或有一些文人士大夫提及墨子,也大都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其进行诘难,肯定墨子者凤毛麟角。直到晚明反传统思潮兴起,出于论战的需要,才有学者扬墨抑儒,例如李贽。可以看出,古代的墨学研究主要围绕儒墨之争或儒墨学说的优劣来进行,而且大都分散在序跋和评点中,缺乏深入的辨析和考究,这种状况直到清代也不例外。在清代只有个别几位学者对墨家思想持赞扬态度,例如汪中、俞正燮、俞樾以及孙诒让等。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古代墨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肯定了墨家学说的救世价值。“孙诒让从墨子生平、墨家弟子及学派、墨家学派诸书及时人论墨、后人评墨等角度,为墨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并发表自己相应的看法,可谓清及其前墨学研究的大总结。”^①

墨学的真正复兴还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墨学研究之所以会在20世纪复兴,与西学的传入密不可分。除了西方科技,基督教教义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传入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带动了墨学研究的热潮,尤其是墨学中的社会政治学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民主、博爱,都能在墨子思想中找到相类似的学说。在20世纪初的墨学研究中,出现了两位大师级人物——梁启超和胡适,前者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义理的阐发上,后者则更多在研究方法上带来了开创性的转变。梁启超从时代要求出发,认为只有弘扬墨学,才能改造国民的自私性。他对墨学义理的阐发经历了从前期“天志纲领说”到后期“兼爱基础说”的剧变,分别以1904年出版的《子墨子学说》和

^① 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921年出版的《墨子学案》为代表,其思想的转变源于其间的一次游欧经历。在《子墨子学说》中,梁启超第一次对墨家的宗教论说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墨子以宗教思想,为其学说全体之源泉,所以普度众生者,用心良苦矣”^①。他指出天志是兼爱学说的前提,明鬼在于“检束人心”,非命则在于劝人勿“偷息”。^②此期的张采田在《原墨》一书中也持有如此的观点。不过梁启超在后期的《墨子学案》一书中却否定了自己之前的主张,提出兼爱是墨家的根本观念和“十论”的基础,将天志与兼爱的关系倒转。以往认为天志是兼爱之前提,现在却认为天志是兼爱主义的后援,即实行兼爱的一种手段。此外,梁启超还就墨子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认为墨子的经济思想是以利为先,又从国家起源论的角度探讨了墨子的尚同政治学说,将墨家学说的精神概括为实践性。梁启超的义理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论述形式上的贡献主要是,将墨家思想分为宗教学说、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兼爱学说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成为20世纪墨学义理研究最基本、最常用的形式。在论述内容上,首次把“十论”作为墨学义理研究的最主要论题,并探讨了“十论”间的关系,这成为20世纪墨学义理研究的重要课题。^③

20世纪中期是墨学义理研究的全面展开期,但此期取得的成就却乏善可陈。因为与前一阶段的顶级大家相比,学者们在国学功底、学术眼光和西学的系统训练方面都大为逊色,故而研究较少新见,多陈陈相因,转述他人研究所得而稍加变化而已。改革开放后(1977—1999),墨学义理研究迎来新的高潮,出现一些别具特色的研究著作。但此期义理研究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一是80年代出版的墨学论著依旧采用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经济基础决定论”、“阶级分析法”、“唯物唯心区别法”等学术研究方法,作出了诸多形而上学的论说,例如詹剑峰的《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冯友兰、刘毓璜等对墨学的论说。二是90年代中后期的墨学义理论著基本采取了三四十年代那种依据材料归纳分析墨学思想的传统方法,在学术观点上也没有太大的突破。三是此期台湾地区的墨学义

①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一章之《结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8页。

② 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③ 参见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1页。

理研究,也同样存在着重复旧说的的问题。^① 总之,20 世纪的墨学义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也遗留了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下面就 21 世纪前十年(2000—2010)的墨学义理研究情况作一下简单的梳理。除去对文本本身的注疏类著作、对墨辩的逻辑科技思想的阐释专著和对墨学史的研究著作外,此期单纯从义理上阐发墨子社会学说的专著 20 余种,其中有些属于通俗类著作。博士论文 5 篇,但只有 1 篇与此论域有关;硕士论文 62 篇,与此相关的 40 余篇;期刊文章 1000 多篇,包括各个角度的研究。此期的研究专著大部分都属于综合研究,即将墨子思想分为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管理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人口思想等来综合论述;还有的属于大全式研究,将墨子生平、《墨子》文本考证、墨子社会学说、墨辩逻辑思想等进行统论和总述。这都没有跳出梁启超确立的框架,在观点上也几无创新,只是结合当下的社会情况再作一番论述。而且这种综合式研究面面俱到,对每一部分都很难作出深入的考究。其中有两本著作不落窠臼,展现出些许新意和亮点:一是苏凤捷、程梅花的《平民理想:〈墨子〉与中国文化》;二是薛柏成的《墨家思想新探》,二者都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墨子学说的渊源和内在隐性传承以及对其他学派的影响。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综合研究属于横向研究,那么这种影响研究就属于纵向研究。期刊论文主要围绕“十论”作一些现代性的阐释,那些专门阐发墨子思想现代意义的论文显得较为空泛,且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有点新意的是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文章,包括与西方思想的比较和与传统文化其他诸子的比较。前者如与基督教、西方政治哲学、西方功利主义等的比较,后者如与儒家、道家、法家、周易以及晏子的比较等,还有几篇文章提到了墨子思想对鲁迅的影响。此期台湾出版的专著有:李贤中《墨学:理论与方法》、吴进安《墨家哲学》、周富美《墨子、韩非子论集》等,这几本几乎每本都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学术力作。李贤中《墨学:理论与方法》对于墨学本身的方法以及研究墨学的方法都有非常集中而系统的论述。吴进安《墨家哲学》以道术二元的结构从三个层面即哲学预设、现实关怀和制度层面解读墨子

^① 参见郑杰文:《20 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3 页。

思想,其特色之处是将墨子思想表述为知识论、价值论、关怀论、控制论、和平论、治国论、正义论、生活论等现代术语。周富美《墨子、韩非子论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其中也不乏一些独到之见,她将墨子思想定位为实学。从外文文献的情况来看,墨子研究在国外还属凤毛麟角。

这一时期的某些专题研究著作带上了时代的新意,尤其出现了一些从管理学角度阐发墨子思想的著作。进入21世纪,在经济大潮和学科建制的推动下,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以及文化管理等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起来,由此催生了管理学研究的热潮。受此影响,学者们也开始尝试着从管理学的角度挖掘墨子思想在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上的价值。台湾学者王讚源在其《墨子》一书中最早解说了墨学对当代企业管理的指导意义,开时代风气之先,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此之后又有相关专著问世,例如1999年熊礼汇、熊江华编著的《墨子与 modern 管理》,2006年彭双、涂春燕的《墨子管理思想研究》和陈转青的《墨家管理思想研究》。这都是从管理的角度对墨子思想做的专题研究,王讚源主要提出要在企业中弘扬墨子兼爱式伦理精神。熊礼汇、熊江华编著的《墨子与 modern 管理》主要从领导者的人格、人才学、统治术和经营之道方面阐发墨子的思想,并发掘出墨辩中的论辩艺术,这是一种应用式研究。彭双、涂春燕的《墨子管理思想研究》则是用现代管理学的体系和术语重新表述墨子的传统思想,主要围绕“十论”,将其表述为决策思想、组织思想、人力资源管理思想、领导艺术思想、人际关系协调思想、沟通思想以及理财思想。用谭家健的话说:“此书运用现代管理学理论审视墨子思想,角度比较新颖,使用概念范畴与一般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有所不同。”^①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但偏重于制度层面的应用,在理论上显得不够内在和厚重,缺乏立论根基。陈转青的《墨家管理思想研究》主要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先概括了墨家的管理观,然后将其与西方管理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比较,最后探讨了墨家管理思想对当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认为墨家的管理思想更适合现代社会和企业的发展要求。“此书各章不乏创意,尤其后五章,有些地方较为

① 谭家健:《近年来墨学研究之新收获》,《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5卷第4期,第9页。

精辟。”^①此外,从经济管理方面阐发墨子思想的期刊文章也有60余篇,这些文章大多从企业文化、理财消费、人才管理、团队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存在的问题是几乎都停留于对管理应用的阐发上,缺乏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遮蔽了墨子思想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得在墨子思想与管理应用之间出现一种断裂。

二、存在的问题

纵观学界对墨子社会学说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分科研究破坏了墨子思想的整一性和系统性。从20年代起出现了分科研究,一般分为墨子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管理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人口思想等。这是从20年代到今天最常见的一种论说方式,这有助于促进墨家社会学说研究的深化,但也影响了墨子思想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容易带来立论根基认识上的模糊和轻源重流的倾向。二是新近出现的从管理学角度阐发墨子思想的著作或文章,偏重于理论的应用,缺乏对理论根基的深入分析、挖掘和探讨。这种研究方式的特点在于结合了时代特点,用管理学的术语进行言说。但问题是,大都停留于对管理现象的描述,很少能深入到管理思想的内部。整个立论也十分零散,没有统到一个总体精神上。例如熊礼汇、熊江华编著的《墨子与现代管理》,就十分典型。

总之,从管理学角度阐发墨子思想并与企业管理或行政管理相结合,是一种新的研究动向。新近出现的这些滥觞之作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在阐释上出现的漏洞以及表现出来的稚嫩和牵强之处都在所难免,这也意味着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阐发空间。对墨子管理思想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理论的应用层面或者只对部分理论作一鳞半爪的阐发,也不能仅仅停留于与各家优劣的对比上,应该从整体上将墨子思想还原为道术一元的统一体,使形而上的理论根基和形而下的管理应用一以贯之。只有明晰墨子思想的整体性和内在肌理,才能弥合在墨子思想与管理应用之间出现的断裂,从而使墨子思想在当今的管理学中得以真

^① 谭家健:《近年来墨学研究之新收获》,《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5卷第4期,第10页。

正的传承与复活。

第二节 选题立意

在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管理者的管理如何得到被管理者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如何防止被管理者出现自由散漫、一盘散沙的局面,从而使管理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管理的认同就不可能有管理的落实,认同是落实的前提;同样,如果没有管理的落实,认同也就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落实是认同的体现和保障。可见,管理既需要效力和权威性,又需要有正当性。说到底,这是对管理权从形上到形下一体化的规范问题。本书的论题就主要围绕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以道术一元的方式分析管理权的规范问题,探讨怎样的管理方式能够使管理更加有效且合理。

对此,墨子给出了一种回答,那就是提出了义政管理,由此构建一种正义和谐的群体秩序。义政管理不仅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灵丹妙药,也是一般意义上处理人我关系的根本智慧。一个群体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经常会发生利益上的纠葛甚至冲突,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平衡,那么就只能走向敌对和争斗。墨子认为这正是一切灾祸的根源。对此只有推行义政管理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义政以兼爱为人性根基,兼爱意味着平等和互利,这是一种交互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可以形成爱之网并由此而打开一个公共空间。如果说义政是管理目标,那么它并不是孤立的,它有形而上的理论预设,还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从形而上来说,义政背后的人性根基是兼爱,形上学根据则是天志,这三者彼此关联。天志是义的来源和根据,义是天志的体现,兼爱则是实现义的机制,也是天志的属性和要求。从形而上的维度回答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只有来自天志的正义的管理才能得到被管理者的认同;回答第二个问题则是:天志的赏罚功能可以对被管理者形成一种约束。从形而下来说,义政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包括:“非攻”之竞争战略、“尚同”之组织管理、“尚

贤”之人员管理、“节用”之财政管理等。这从各个方面体现了义政管理，也从各个侧面具体回答了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即管理的认同问题和管理的落实问题。这些操作层面的理论虽然偏重于管理的落实，但都无一例外地以正义性和管理认同作为前提。可以看出，墨子以义政为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是对管理权的一套规范方式，可以为管理中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借鉴。

之所以选择墨子思想，是因为义政的人性根基兼爱是面向他人的交互逻辑，这比儒家以血缘为基础区别亲疏远近的扩展逻辑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日本的池田大作认为，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① 英国的汤因比也指出，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情感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② 可见墨子的兼爱主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之所以将墨子思想作管理学阐释，是因为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开出的治国方略，与现代的管理之道尤其行政管理有相通之处，可以为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带来很大的启发性。墨子基于战国时代的形势提出的对统治权的约束，也可为当下提供借鉴。此外，从管理学角度阐发墨子思想，还可以使古代的思想资源现代化，使其借着现代管理学的平台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流淌在血液中的，这是研究中国管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文化范式凭空产生一种管理学。“未来社会的经济竞争更集中地体现在管理文化的差异上，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又是其管理文化的核心。故而，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不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吸收养分，以形成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管理理论，进而保证经济活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③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传统，在审察和研究中使其发展创新，为当下服务。

① 转引自陈转青：《墨家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扉页。

② 转引自陈转青：《墨家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扉页。

③ 罗移山：《墨家社会管理学的现代意义》，《开放时代》2001 年第 4 期，第 85 页。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道术一元的研究方法,从管理学角度阐发墨子的思想。对墨子文本本身的解读历来呈现为二元化的局面。由于墨子思想中既有超越的一面,又有实用经验的一面,所以研究者们要么将目光集中到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上,抓住在上超越之“天”,将其看为宗教学说,并与西方的“上帝”观念相比附,例如胡适就将墨子“十论”称为墨教;要么抓住墨子实用经验的一面,将其定位为唯物主义,着重在“三表法”以及节葬、节用、非乐等思想上做文章,将其看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台湾学者吴进安在《墨家哲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全书在架构上采用道术二元的观念。将墨子思想二元化其实是一种人为的割裂。墨子的思想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不可能有两个立论根基。本书尝试采用道术一元的研究方法,试着将墨子思想还原为一个整体。道术一元的方法可在《易传·系辞上》中找到理论根据:“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①居于形体之上的不可见的精神因素称之为“道”,居于形体之下的有形可见的物态称之为“器”,二者交感化育,循道而裁节就叫作“变”,推行变的法则就可“通”,将这些道理用于治理天下之民则可成就事业。从“道”到“器”最后再到“事业”,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与墨子思想十分契合,或者说墨子思想正是遵行了这样一条理路。

具体一点说,墨子思想是以贵义为中心的,在它背后有人性假设和形而上的理论预设,也就是兼爱、天志等理论;在其之下又有形而下的落实操作层面,包括非攻、尚同、尚贤、节用等主张。天是义的来源且兼爱天下之人,因此要求天下之人也像它那样贵义兼爱,并通过赏善罚暴来促成贵义兼爱的贯彻落实。墨子反对侵略性的攻伐,却赞成正义性的诛讨,就体现了他对义的追求和对他人之爱的提倡。尚同主张在层层上同的过程中将权力让渡出去,从而将从天而来的正义承接到管理中。权力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63页。

是天借着职位赋予的,权力属于职位,属于天,而具体的人只是一个代理者和执行者。在尚贤主张中,贤士的判别标准依据的是其言行是否顺天之意。节用提倡当用则用,不当用则止,符合“三表法”、能够为民众兴利除害的当用,否则就不当用。可见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依旧是贵义。

总之,墨子的管理思想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整体,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学说,是墨子针对当时的统治权问题开出的一剂药方。就像《易传·系辞上》那段话所说的,这是一个从“道”到“器”最后再到“事业”的理论体系。因此,将其二元化是毫无道理的。本书尝试以道术一元的方式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墨子的思想。此外,在体例上本书尝试采用范畴整理法。围绕墨子十论几个基本范畴架构全文,并将其与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相对应。例如贵义对应于管理目标,兼爱对应于管理的价值原则,尚同对应于组织管理,尚贤对应于人员管理,节用对应于财政管理等。范畴整理法是一种以点带面的方法,可以使论证条理清晰并系统化。